

# 威妥瑪漢字字母化的追求—— 論新發現威妥瑪謄抄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 及裨治文《廣東方言彙編》手稿\*\*

關 詩 珮\*

## 摘 要

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是知名的漢學家及外交官。他在漢學意義上開創甚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創設的威式拼音。威式拼音出現以來，大大方便了西人學習漢語的方法，特別是讓西人更易掌握漢字的讀音以及從音記義的學習過程。在威式拼音前，歐洲人已有以拉丁音轉化漢字的基礎，亦可以說，威妥瑪是集合各家所成，以當時北京官話的發音方法修正在西方流行的拼音方案。不過，即使威妥瑪及其拼音在漢學史上有著這樣的重要性，但學界至今對他如何創制威式拼音的知識準備、鑽研學習方法所知不多。

筆者在歐洲發現的威氏手稿就特別有史學上的意義了。從手稿可見，威妥瑪以謄抄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及裨治文《廣東方言彙編》作為學習漢語的方法，形音義並重之外，亦重知識整理管理方法，特別是如何以字母拼寫作為整理不同漢語知識的串連系統。而仔細爬梳文獻，我們不單能理解抄寫並不純為刻板複寫手段，威氏抄寫的過程，修正增訂並改寫前人文本的心思歷歷在目。而配合 1840 年代初中葉威妥瑪處身香港的歷史語境，更可讓我們重組在物質匱乏的香港及機械印刷複印大行其道前，此手稿的功能及意義。

**關鍵詞：**威妥瑪、馬禮遜、裨治文、漢語、廣東方言

---

2015 年 4 月 16 日收稿，2016 年 9 月 26 日修訂完成，2016 年 11 月 17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本文為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資助研究計劃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資助項目「M4011329.100 RG90/14」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致謝。

## 一、引言

毋庸置疑，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在漢學研究上是極重要的人物。他為英國外交部主持的學生譯員翻譯課程、他創設的威式拼音（後經學生翟理斯（Herbert Giles, 1845-1935）修訂而成為威翟拼音（Wade-Giles System））、他捐贈大量圖書給劍橋大學而促成該大學首任漢學教席的成立，<sup>1</sup>都為西方漢學（特別是英國漢學）立下了奠基之功。

不過，即使威妥瑪在漢學史上有著這樣的重要性，但學界至今對他的研究其實並不算豐富。當中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關鍵因素，與他傳世的文獻不多有密切關係。從原始資料上，迄今可見而最為人所共知的，是他捐贈到英國劍橋大學的資料。<sup>2</sup>但只要學者曾翻閱藏於劍橋大學檔案室威妥瑪私人藏件及手稿（GBR/0012/MS Add 6318）的資料，就會感覺到這些文獻其實是經過他高度篩選而來的，原因有三：第一，相對他豐富的外交生涯及學術業績，當中的文獻量不成正比。第二，這些資料內容既乏善可陳、亦多為斷簡殘章，劍橋大學的藏件中，不少是有關中國的英報輯存。英報輯存固然有助研究他自珍的報導內容，但由於報刊本身是公眾資源，而今天這些報刊也大量地收藏在能檢索的英報資料庫，這類資料的價值只能算是聊備一格，無足輕重。如果審視他的閱讀筆記，只會發現裡面的內容沒有反映任何學問體系，難以說是具有深度及有系統的思路。第三，這些筆記多以龍飛鳳舞的字跡所寫，這似乎與威妥瑪一貫的行文風格有很大出入。要知道，威妥瑪的文牘，一向都是以字體秀麗見稱，而且整齊有序，筆者在下文即將要討論的歷

---

1 Charles Aylmer, "Sir Thomas Wade and the Centenary of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 (1888-1988)," 《漢學研究》7.2(1989.12): 405-422.

2 鄭志民、彭桃英、楊曉寧，〈英國劍橋大學威妥瑪中文特藏〉，《江蘇圖書館學報》1992.2: 42-44；J. W. Clark, *Endowm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4), p. 252; D. L. McMullen,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 Wide-Ranging Scholarship from a Doubtful Start," *The Magazine of the Cambridge Society* 37(1995): 62-66.

史遺珠——他作為工具書的手抄字典，<sup>3</sup> 同樣字體工整，結構有條不紊。從此推斷，他捐贈給劍橋大學的手稿，只是他的部分筆記，而且不是他最珍藏的。況且，他曾叮囑家族後人不要公開或變賣他遺留下來的私人物件，<sup>4</sup> 從這點我們就知道，威妥瑪銳意要減少傳世文獻，以避免成為後世研究的對象。他這樣做，很可能是長年在官場或外交部工作，歷練成一種謹慎的行事方式，也可能是他本身的性格使然。與威妥瑪交往的同代人曾指出，他性格內斂、木訥寡言、極度務實，如無必要，絕不滔滔不絕。

可以想像，學界要研究這樣一位長期叱吒中英外交界的漢學家，在取材上會遇到不少的限制。過去史學界依賴的原始文獻，在中英外交史而言，有《清史稿》、《太平天國》、《籌辦夷務始末》、《近代郵電交涉檔案彙編》<sup>5</sup> 等等公文及檔案資料彙編。英國方面，最豐富的固然是收藏於英國國家檔案館的外交部及殖民地部檔案。另一些比較零散渺茫的，就是他因公私事致函給同代人的信件，但這些檔案是否仍然存世則要看歷史機遇。漢學方面，除了劍橋大學的收藏外，研究者多依賴他在擔任英國外交部漢文正使前後，為外交部翻譯課程擴寫的幾本譯員教科書《尋津錄》、<sup>6</sup>《語言自邇集》<sup>7</sup> 及《文件自邇集》的內容。<sup>8</sup> 在這些書的序言中，他簡單地交代學習漢語的點滴心得以

---

3 從現在所有威妥瑪的自述文獻及有關威妥瑪研究的文獻所見，威妥瑪從無述及這部手稿，也從無言明自己抄寫馬禮遜或任何漢學家的辭書作為學習手段。

4 James Cooley, *T. F. Wade in China: Pioneer in Global Diplomacy 1842-1882* (Leiden: E. J. Brill, 1981).

5 中國史學會主編，王重民等編，《太平天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陳湛綺編，《近代郵電交涉檔案彙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9）。

6 Thomas Francis Wade, *The Hsin Ching Lu, or Book of Experiments; Being 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Hong Kong: China Mail, 1859).

7 Thomas Francis Wade, *Yü-yen Tzū-ê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in Eight Parts, with Key, Syllabary, and Writing Exercises* (London: Allen, 1886).

8 Thomas Francis Wade, *Wen-chien Tzū-ê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 Designed to Assist Students of the Language as Written by the Officials of China in Sixteen Parts* (London: Trübner, 1867).

及他的學術抱負。不過，由於資料太簡單，學界對於他如何學習中文、師從哪一位，以及他的治學方法等，都沒有準確把握。特別是他早年來華尚未成為政壇新貴前，亦即是創制出威氏拼音的那段時期，學界就更苦於沒有原始文獻而無法確定。可幸的是，學界近年對威妥瑪的研究，隨著在新材料出土、對比史料考據以及新史學觀等衝擊下，作出了不少突破。<sup>9</sup>

筆者在歐洲發現被歷史埋沒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威妥瑪手稿，可算是在這嶄新研究氣氛下所作的另一補足。<sup>10</sup> 手稿寫於威妥瑪剛到香港不久後的 1843 年，他通過逐條抄寫漢學先驅暨第一任來華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廣東省土話字彙》（*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的中文詞彙、中英詞條對譯互文意義來學習中文。<sup>11</sup> 手稿質素良好、文字清晰、資料完整無缺，從首頁到最末的第 300 頁，反映了他早年逐字抄寫資料的情形。而於 1846 年，威妥瑪在手稿內作了一次大型的增補。他把 1841 年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的《廣東方言彙編》（*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的部分內容加插在手稿內。本文的論旨，首要在於以手稿研究（manuscript studies）的方法向史學界介紹這部文獻，<sup>12</sup> 並將論及以下幾點：1. 從手稿具體反映威妥瑪在 1840 到 1846 年間習得的漢語程度，包括漢語文法、漢字詞彙、廣東話語言等各種知識，以及通過比較威妥瑪手抄本與《廣東省土話字彙》原版的不同，透現 1840 至 1846 年間語言變遷（南方官話或方言）的情形。<sup>13</sup> 2. 通過威妥瑪編訂手稿的

---

9 見 Pär Cassel, “‘Spelling Like a State’: Some Thoughts on the Manchu Origins of the Wade-Giles System,” in “The Manchus and ‘Tartar’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Empire,” special issu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58.1-2(2015): 37-47; 內田慶市、氷野歩、宋桔編著，《語言自邇集の研究》（吹田：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5）。新的詮釋，見 James Hevia, “An Imperial Nomad and the Great Game: Thomas Francis Wade i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6.2 (1995): 1-22.

10 本文作者已重印手稿，將於 106 年春季出版。

11 Robert Morrison,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3 parts (Macao, China: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8). 《廣東省土話字彙》為原書名中譯。

12 M. B. Parkes, *Scribes, Scripts, and Readers: Studies in the Communication, Presen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edieval Texts*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91).

13 余靄芹，〈粵語方言的歷史研究——讀《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中國語文》2000.6: 497-507。

方法，探討他處理漢字系統的知識技能 (technologies of Chinese writing)。<sup>14</sup> 換言之，本文的要旨不只是在語言研究或漢學研究之上，還在於見微知著，反映十九世紀外國人學習中文的過程及方法、1840 年起的印刷出版及知識傳播管道，甚至嘗試補充西方手稿研究中比較空白的範圍。西方手稿研究一直以西方宗教類及歐洲語文作主導，而中國研究又主要以漢語典籍作為研究重心；<sup>15</sup> 至於外國人以英語撰寫中國知識的手稿，卻在歷史文獻不足或過去漢學被邊緣化的情形下，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下一節，我們會一邊介紹《廣東省土話字彙》及《廣東方言彙編》的原稿，一邊補充威妥瑪學習中文的背景，以及當時中文教材困乏的情形，以此脈絡化這手抄本的歷史意義。筆者近年的研究議題，是英國漢學如何在英國外交事務上譯者不足、翻譯水準不濟的情形下促成學科建立，以及詳看在這政經因素交纏下，英國編織出的十九世紀漢學的學術圖譜。當中會論及知識建構的內容和方向、學術網路以及人員（譯者與教學人員）專業化問題等等。由於威妥瑪在英國外交部及英國漢學兩方面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筆者曾就他在漢學及外交部翻譯課程的貢獻發表了兩篇文章：〈翻譯政治及漢學知識的生產：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畫（1843-1870）〉、“Politic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 into World Language”；<sup>16</sup> 另有未發表的演講稿 “Technologies of Chinese Language: Thomas Wade, Interpreter

---

14 Barry B. Powell, *Writing: Theory and History of the Technology of Civilization* (Chichester, UK;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9); Raymond Williams,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或見下文第三節討論。

15 Lucille Chia and Hilde de Weerdt, eds.,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Leiden; Boston: Brill, 2011);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16 關詩珮，〈翻譯政治及漢學知識的生產：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畫（1843-187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1(2013.9): 1-52。Uganda Sze Pui Kwan,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 into World Language,” in David Der-wei Wang, ed.,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forthcoming).

Train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omanization”。<sup>17</sup> 文章撰寫過程中涉及大量威妥瑪手寫的原始檔，所以本文能在一定的字跡（paleography）及作者身分（authorship）上再作深入討論。亦是這個原因，該系列文章中已提出的相關考證及資料，以及已深入討論過的問題，在此不贅。

## 二、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

史學界都知道，威妥瑪於 1839 年曾參與鴉片戰爭，隨皇家英軍 98 軍團輾轉到華。他出身官胄之家，父親爲他購入官階成爲陸軍中尉。由於他本身對語言抱有極大的興趣及天分，再加上很早認定自己並非擅長軍事，所以他於來華戰艦上已自學中文，爲自己打下學習中文的基礎。威妥瑪參戰時，英軍譯者不足而造成情報出錯的問題，他一定亦有所聞。<sup>18</sup> 我們並未找到他像其他軍人般，抱怨譯員不足的證據。在他存世的資料中，最廣爲人知的牢騷，是初學中文不得其門而入的苦惱。《南京條約》簽訂後，威妥瑪便立即請教有名望的漢學家，詢問漢語水準首屈一指的前輩如何獲得學習中文之門徑。他

---

17 Uganda Sze Pui Kwan, “Technologies of Chinese Language: Thomas Wade, Interpreter Train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omaniz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23 November, 2014 及 Keynote Speech, “The Imitation Gain: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ies of Chinese Langua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ranslation History, organised by the Graduate Program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GPT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26-27 March 2016. 兩篇講稿討論到威妥瑪身為英國駐京領事，督導鋪設電線成立電報公司，固然是為了促成外交科技資訊現代化，方便英方傳送情報、增加貿易在中國奪得更大的利益等，但這其實亦影響著中國知識轉化的重要過程，方塊字體的漢字如何翻譯成電報，必先經過編碼及解碼過程，而拼音式標示漢語是第一種嘗試，這些全都影響十九世紀中西方漢學家大規模把漢字去掉字形、字義以及形成字母化或拼音文字的重要階段。

18 軍人高呼譯者不足的聲音，在鴉片戰爭期間的文獻內隨處可尋，在此不個別舉例。見 Uganda Sze Pui Kwan, “‘A Requisite of Such Vital Importance’: The Want of Interpreters in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 (1839-1842),” in Lawrence Wang-chi Wong, ed., *Towards a History of Translating: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4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Hong Kong: Research Center for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vol. 3, pp. 389-417.

得到的答案卻是：「先生，你說要學習中文，到底是哪一種漢語？」而他向第一位德高望重的漢學家請教時得到的回答：「漢語有典籍的文體，有比較現代的語言，有公牘文章，以及語體文，當中還要區分無數方言。那麼，您要學習哪一種呢？」<sup>19</sup>的確，漢語言文不一，而且語言區域廣泛，不要說外國人，即使中國人也會有南腔北調而無法溝通之苦。威妥瑪沒有透露這位漢學家是誰，更沒有透露他隨軍自學所依賴的教材。不過，早年英國人要學習漢語，大都根據傳教士帶回歐洲的材料（如漢學巨擘史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就以傳教士畢奧（Padre Adeodato di Agostino）神父贈送給他的拉丁漢語字典（Latin-Chinese Dictionary）學習漢語），或一些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資助，於廣東、澳門或馬六甲出版的教材（下文馬禮遜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由東印度公司資助出版）。比威妥瑪要早到華的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第一任漢學教授費倫（Samuel Turner Fearon, 1819-1854），就是通過衆多歐洲語教材（如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中國言法》及馬若瑟（Joseph Henri de Prémare, 1666-1736）《漢語割記》等）學習漢語。<sup>20</sup>而跟威妥瑪同一時期在香港的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第二任漢學教授佐麻須（James Summers, 1828-1891），就以法國漢學者如雷暮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的研究入手。<sup>21</sup>

威妥瑪在苦無便捷的學習途徑下，只能向不同的漢學家請益，苦求良方。他當時的漢語程度具體如何，我們在下文能作一定的推論。不過肯定的是，他當年的中文程度雖不足以協助三名草擬《南京條約》的譯者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羅伯聘（Robert Thom, 1807-1846）及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但卻足以協助皇家戰艦主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 1789-1856；第一任香港總督，任期為 1843 至 1844 年），並跟隨他到江蘇、南京及廈門等地作軍事譯者，這些都會在下文進一步

19 Thomas Francis Wade, "Preface to First Edition," *Yü-yen Tzū-êrh Chi*, pp. xii-xxv.

20 Uganda Sze Pui Kwan, "Translation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Mission: The Career of Samuel Turner Fear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 King's College, Lond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RAS)* 24.4(2014.10): 639-640.

21 關詩珮，〈翻譯與帝國官僚：英國漢學教授佐麻須（James Summers, 1828-91）與十九世紀東亞（中日）知識的生產〉，《翻譯學研究集刊》17(2014): 35-36。

討論。

在手稿發現之前，歷史學家只把威妥瑪歸入郭實獵門下。<sup>22</sup> 郭實獵及威妥瑪兩人的著述中，從無這方面的佐證，不過兩人當時同在香港，並同為香港殖民政府效力。而身處香港的英國人及當政者都深深明白，缺乏漢語專家會直接損害大英帝國在華的利益，因此身為外交部漢文正使（Chinese Secretary；威妥瑪後來繼任此位）的郭實獵，於公餘的時候指導威妥瑪，是很有可能的事實上，郭實獵在澳門成立的宗教團體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一直有開班授徒，教導外國年輕學子中文。他亦曾以這個理由，向香港第二任港督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進言，希望當時香港政府將資助兩所在港辦學團體的資金，如香港馬禮遜學校（Morrison Education School）或香港聖保羅書院（Hong Kong St. Paul's College），轉到他名下的教育機構，助他另起爐灶。他指上述這些學校，只教導中國人英語，而非教導來華外國人漢語，忽略了大英帝國的當務之急。此外，由於這些學校擁有自身的辦學宗旨，而且教學內容廣泛，學生語言程度又不一，要這些機構為殖民政府培養雙語人才及譯員，並不實際。外國年輕人在香港學習漢語，全都是權宜之計，政府既沒有遠景也沒有藍圖。<sup>23</sup> 他當時利用了威妥瑪在港學習的情形，乘機向政府獻計，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威妥瑪當時極受第二任香港總督德庇時賞識，視為可造之材。我們沒有看到威妥瑪曾經入讀這些教學機構，不過，他需要艱苦自學，則是不容否定的。新出土的手稿，能讓我們看到在這樣匱乏的學習條件之下，威妥瑪曾以重抄字典作為研讀方法，轉折受益於馬禮遜：

威妥瑪於手稿扉頁上（圖一），自珍地寫上手稿的成書過程：

Copied by me from Dr Morrison's Canton Vocabulary, now almost out of print, between the months of July and October 1843. I look upon it as the most valuable assistance to the student of the Canton dialect, who must however add

22 Jessie Gregory Lutz 的書內雖沒有什麼明顯證據支持這說法，但學者一直沿用此說。見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 177.

23 關詩珮，〈翻譯課程及全人教育之爭？香港聖保羅書院與香港政府的恩怨（1849-55）〉，《翻譯史研究》4(2014): 77-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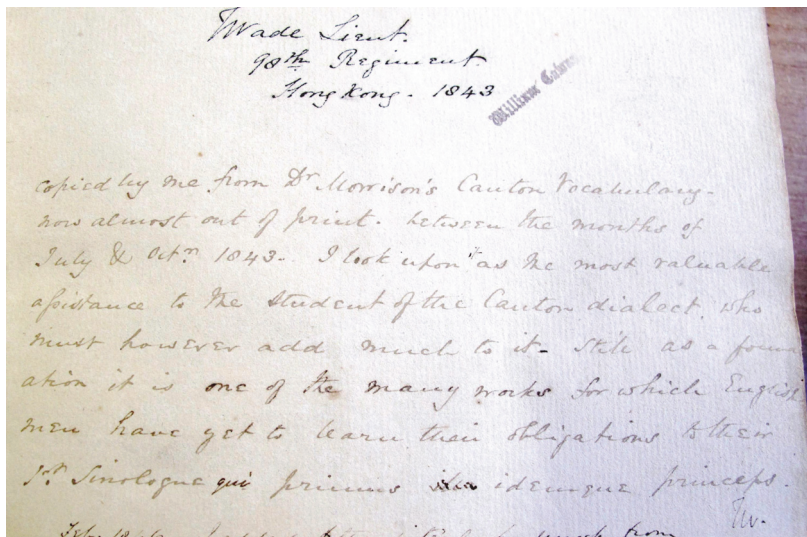


much to it. Still as a foundation it is one of the many works for which Englishmen have yet to learn their obligations to their 1st Sinologue *qui primus idemque princeps*.

Wade lieut.

98<sup>th</sup> regiment

Hong Kong 1843



圖一 威妥瑪手稿扉頁

如圖一所示，扉頁原文用英語寫成，有威妥瑪的簽名。威妥瑪有著傳統西方人文學學者的氣質，行文內常常會以拉丁文表達專有概念或慣用語，圖一最末一句引文所寫的 *primus idemque princeps*，大概指馬禮遜是當今天下第一之意。全段可以翻譯為：

此為我於 1843 年 7 月到 10 月間謄抄馬禮遜博士現已差不多絕版的《廣東省土話字彙》。我認為這書對學習廣東方言的學生而言是最珍貴的教材，雖然無可避免地要作一些增訂。即使如此，作為基礎入門書，我們國人還未盡應有義務向當今第一人的漢學家馬禮遜好好學習。

這段引文有多項重點。首先，威妥瑪從 1843 年 7 月到 10 月，以四個月的時間抄寫整部多達三百多頁的字典，當中包含共六千多條的詞條及釋詞。若他持之以恆地每天習字，每天最少需要抄五十多條。過程中所需要的體力、專

注力及意志力，絕對不容輕視。這反映威妥瑪這段時間高度集中專注學習廣東話外，也顯示了他受制於借閱字典給他的期限。威妥瑪直言《廣東省土話字彙》(*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從 1828 年出版到 1843 年的十五年間，原版差不多售罄，一書難求。亦即是說，有人向他推薦《廣東省土話字彙》的重要性及價值後，他嘗試購買卻無法購得，在絕版加上原來字典流通量有限的情形下，他只能向同仁借閱，並要在大概四個月限期內抄寫完畢。對出借者而言，這字典必定是當時極重要的參考書，無法長期外借。

從十七世紀到北京設領事之前，廣東方言在中英貿易上擔當了重要的角色。雖然今天稱作廣東一帶地區，與十九世紀的地理範圍及政治管轄區域，並不完全一樣；當年的粵語在文法及語音上，與今天的廣府話，亦有一定的分別，<sup>24</sup> 然而這也無損廣東話作為中英貿易中重要語言的事實。從清廷實施海禁到鴉片戰爭前，廣州商館是中國境內唯一容許外國人寄居之地，外國人在指定的貿易季節內，從澳門湧到廣州十三行內作交易買賣。會館內譯員極度不足。因此，為了營商，跟官員、十三行行商、商館職員溝通，外國人也許會學一些簡單的廣東省方言，以應付日常需要；相反，服務商館的人員會說一兩句洋涇浜英語 (Pidgin English)。由於洋涇浜用語並不統一，物品名稱亦五花八門，英國東印度公司為增加貿易上的方便，減少因誤會而招致的損失，所以希望統一貨物的名稱及拼字法。<sup>25</sup> 公司遂於 1827 年 3 月，要求馬禮遜在公司內開設廣東話課程，以滿足職員學習廣東話的需要，而《廣東省土話字彙》就是課程的教科書，出版及印刷費用由公司資助。《廣東省土話字彙》收有十八及十九世紀廣東省及南中國海一帶常用的廣府話之外，還記載了很多當年廣東人慣用的中文成語和文言文片段。《廣東省土話字彙》全書分

---

24 余靄芹，〈粵語方言的歷史研究〉，頁 505；Don Snow, *Cantonese as Written Language: The Growth of a Written Chinese Vernacul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esp. chapter 4, "Written Cantonese in Pre-Modern Guangdong," pp. 67-100; Kingsley Bolton, "The Life and Lexicography of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in Robert Morrison,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reprint of 1828 edition, Ganesha Publishing;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 v-xliv. Bolton 為英語世界的語言學學者，文章的研究重點在於語音而非漢語詞彙上，與後述片岡新的文章取向不同，具有互補參考意義。

25 Robert Morrison, "Introduction,"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part 1.

三部分：第一部（Part 1）以英語字彙為綱，按字母 A 開始，每詞條後附漢字及羅馬字注音，如單詞 Above 旁，標有「在上」，再配以廣東拼音 Tsoy sheong，然後再有英中用例及釋詞（It is above your head. 在你頭上 Tsoy ne taw sheong....）。第二部（Part 2）仍以字母排列，但以廣東土話字彙為綱（按羅馬注音排序），先標注音，次列漢字，再附英文注釋。如一開首的字母 A 下，我們發現是從大量廣東話中表示親切感的接頭語（或稱詞頭）的亞或阿字開始，<sup>26</sup> 阿哥（或亞哥），排出來為 A-ko 阿哥或亞哥 O-Ko，再以英語釋詞 An elder Brother。第三部（Part 3）為諺語、警言、成語等彙編，按事類編排；每條的排列為：注音、漢字、英譯。

《廣東省土話字彙》一書風行，我們暫時沒有此書的出版數量。根據蘇精的統計，同期由東印度公司出版的馬禮遜著作數量如下：《中文原本翻譯》（*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印數為 100 部、《英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印數為 750 部。<sup>27</sup> 即使我們無《廣東省土話字彙》的具體印數，但可以從東印度公司當時出版的情形作出推斷，馬禮遜的《英華字典》應是最大的印量，而該公司於 1832 年出版的麥都思（W. H. Medhurst, 1822-1885）《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i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印數為 284 部。根據東印度公司檔案，公司說送 40 部此書給董事會。以此推算，馬禮遜字典印 750 部，送 100 部給董事會，按相同比例，廣東省字彙印 300 部，送 40 部。<sup>28</sup>

由於當時外國人學習廣東話的需求甚為殷切，在這樣的熱潮之下，300 本印數絕對難以滿足市場的需求。1829 年 4 月，馬禮遜在寫給自己兒子馬儒翰的信中也明言：「……我才完成廣東話字典的第三部分。說到底，現在學廣東話比北京方言更流行。」<sup>29</sup> 再者，《廣東省土話字彙》出版後大受好評，

26 詹伯慧，《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頁 63。

27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這條資料由黃海濤先生提供，在此致以謝忱。

28 India Office Records (G/12/281),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the Court, 28 January 1830," p. 12. 這條資料得蘇精教授賜教，在此致以謝忱。

29 Eliza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and Longmans, 1839), vol. 1, p. 424.

廣州英國商行在給東印度公司的報告中對此評價甚高，稱「整部著作提供了歐洲人學習中文方便，實現了我們的目標，因而受到高度讚譽」，「通過馬禮遜的寶貴努力，要實現外國人用中文同中國人交往的目標，這時代指日可待」。<sup>30</sup>《廣東省土話字彙》出版後的十多年間，除了在廣東澳門一帶外國人圈子中口碑甚隆外，在 1834 年《廣東紀事報》（*Canton Register*）裡，我們仍然找到相同的讚譽，而且還是遠自歐洲的同仁：

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這部同樣有用的書出版，也豐富了研究地區方言的工具。無疑，這部書的特殊用途最能體現於廣東區，它的寫作本旨就在於促進歐洲人與中國人的貿易交流。但這種工作也應該引起文法學家極度的興趣，因為這樣的工作使文法學家在它各種變化下視察一種語言，在那些有時保存了語文學家覺得最寶貴的事實，以及不同成語的比較分析的方言中來研究這種語言。<sup>3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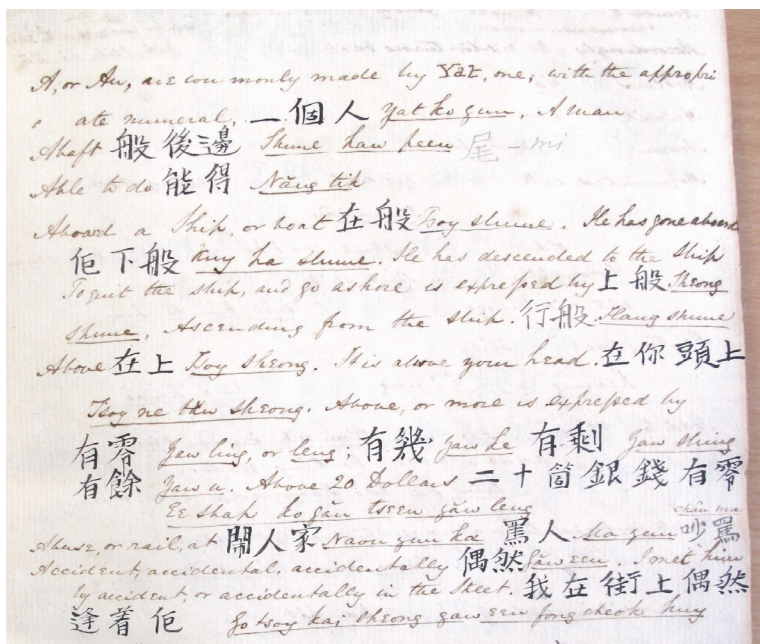
因此，威妥瑪來華前，以學習廣東話為首要目的，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事實上，在這樣的學習廣東話熱潮下，《廣東省土話字彙》本來就供不應求。隨著時代變遷，於 1843 年已身在香港的威妥瑪無法找到《廣東省土話字彙》實在合情合理。其實，《廣東省土話字彙》曾於 1840 年在印度加爾各答（Calcutta）再版。雖然全書內容大致一樣，三部結構亦相同，但由於針對的是英語圈非學習漢語的讀者，所以全書漢字盡皆刪去，書名更被易名為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the Latter in the Canton Dialect*。由於威妥瑪的學習重點在於漢語、中英對譯語，以及廣東拼音，所以印度版並不適合他的學習綱要，他只好捨易取難，重抄一遍。

從威妥瑪扉頁的引文可見，在當時教材匱乏的情形下，重抄字典不失為一個學習語言的折衷方法。事實上，威妥瑪的手稿提供了很多新歷史證據，特別在漢字書寫系統方面，這些論述是印刷品或馬禮遜原版字典所不能提供的。首先我們要知道的是，《廣東省土話字彙》雖說以土語或粵語為名，但重點卻是在字詞和語彙之上，而且側重於字形、字詞及字義，多於語音訓練。從《廣東省土話字彙》全文看到，全書並不特別重視區分聲母符號、音調及

30 Eliza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pp. 401-416.

31 *Canton Register* 7(1834.4): 58.

音標。根據片岡新及李燕萍的深入研究，這並不是馬禮遜不能釐清那些問題，而是因為他在之前的著作（特別是《通用漢言之法》第四部中，已清楚顯示廣東話的一些語言特性（舌根鼻音、送氣不送氣等的問題））。但在編寫《廣東省土話字彙》的過程中，由於考慮到學生的能力，加上不同教材的針對性，因此馬禮遜刻意不標清語音問題。<sup>32</sup> 正是這個原因，我們應重視字典及手稿於書寫系統及詞彙學（lexicography）方面的意義。即使是後來以北京音為拼音對象的威式拼音法，學者都指它不夠重視送氣不送氣的問題。<sup>33</sup> 這點我們會在下文進一步討論。



圖二 威妥瑪手稿正文右邊第一頁，抄寫《廣東省土話字彙》A詞條

- 32 片岡新、李燕萍，〈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中國語文研究》22(2006): 21-36；有關《通用漢言之法》內粵語的標音特色，亦可參考李燕萍，〈對外粵語教學拼音方案的比較與討論〉，載於吳偉平、李兆麟編，《語言學與華語二語教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9），頁 195-209。
- 33 張丹，〈從馬禮遜到馬修斯——近代史上的西方漢英詞典編纂者及其作品〉，載於姚小平主編，《海外漢語探索四百年管窺》（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頁 130-135。

整體而言，威妥瑪的抄寫工夫極為詳盡細緻。從頭到尾所示，全稿行文工整，中英字體端莊整齊（見圖二），內裡並無重大塗改之處。由於筆記簿本身並不是活頁簿，任何筆誤之處需要另頁掩飾，但仔細考察全文，並無發現替換之處。即是說，他以極謹慎的態度謄抄，這裡除了反映他的性格外，更重要的是他對手稿功能的重視。對他而言，這部手稿並不是學習帳或練習簿，隨意試筆練字，而是一本放在案頭的參考書，這亦解釋了它能保存多年的原因。

手稿謄抄的字體端正整齊，並無外國人學習書寫漢字出現的歪歪斜斜，反映威妥瑪在 1843 年重抄字典時，即是他從 1839 年初學中文到接觸《廣東省土話字彙》後的五年間，已練習得漢字的特點結構、詞語構造。一些字形複雜的漢字，如羅、麝、鏰、鳩（飲鳩止渴）等，在抄寫上亦無出錯。此外，字典中有很多短語如主謂賓、複謂結構等，也有歇後語如「啞佬食黃蓮肚裏知（即啞巴吃黃蓮）」，<sup>34</sup> 更有一些慣用語如「有麝自然香」、「籬米（即購米）」、「插翼難飛（即插翅難逃）」等，筆劃都寫得極清晰仔細，並無筆誤，可見他的確用心認字和抄寫例句。如果以今天外國人學習漢語（如《國際漢語能力標準》或對外漢語習得）標準來衡量他當年的程度，他的漢字字彙應達中級或高級以上。固然，抄寫、默寫，與臨場應用是有一定的區別，但我們現在能具體對他的認字及書寫能力，有相對確定的認知。

事實證明，這樣的中文程度，在戰爭後中英外交關係上能大派用場。1852 年 12 月，外交部考慮提拔威妥瑪為上海關稅司時，曾經討論過他的業績及能力。當時首次透露了威妥瑪在 1843 年時，雖然身為中尉，但已掌握足夠的中文知識，而被列為璞鼎查軍中譯員（“sufficient knowledge in Chinese to be named in 1843 by Sir Pottinger as an interpreter for the army”）。<sup>35</sup> 在這之前，威妥瑪已經多次向德庇時表示自己願意辭去軍銜，改為擔任譯員。德庇時雖然明白威妥瑪的心意，卻難以同意或反對已身為中校（lieutenant）的他，在無任何污點下，提早遞辭呈或轉任為低級職員。過去學界一直很少討論這方面

34 由於沒有頁碼，本文以馬禮遜版本中的頁碼頭頁示意。啞巴吃黃蓮見 SHEI-MOW-LUY 頁。

35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Records (以下簡稱 F.O.), 17/197/258-230 (1 December 1852).

的文獻，原因是對於外交部及軍隊而言，威妥瑪參軍卻成為隨軍譯員，這不免是越俎代庖，又或帶點屈辱性質。因此我們從來沒有看到在 1839 到 1843 年間的任何文件，正式地公布或報導他被聘為譯員。鴉片戰爭後，主帥璞鼎查仍然要為五港通商以及《南京條約附屬條文》換約事宜，沿海北上。在譯員不足的困窘情形下，特別是 1843 年 8 月馬儒翰已歿，香港殖民政府又剛成立，譯員人手短缺的問題比戰時更嚴峻，威妥瑪的中文能力正好幫忙協助英國外交事務。從字典中的中文程度所示，威妥瑪這時的詞彙量及漢語水準，應付一般日常軍務，綽綽有餘。如果這樣能反映鴉片戰爭期間三位譯員的中文水準，那麼我們就可以想像三人中文程度的高低了。

不過，從手稿可見，即使威妥瑪的漢語程度已達中上水準，他也不免會犯手民之誤。雖然那些錯誤都是一些無心之失，但背後所帶出的意義，卻不可以輕視。在此先列出這些筆誤之處，見表一。

從表一可見，威妥瑪的錯誤都較統一，他一直誤寫「船」為「般」。由於《廣東省土話字彙》收集詞彙的系統為十三行買賣相關的貨物，詞彙都離不開實用概念的範圍，當中又大量與中國海上貿易、相關工具如商品（茶葉、香料）、關涉人員及機構的名稱有關，所以，詞彙範圍雖廣，但類別卻不斷重複。因此，這些錯別字的情形，就因為詞彙相類而不斷出現。在寫了大概 44 頁後，寫到 deck of a ship「船艙板」一條時，他才醒覺。第一部中涉及船隻的

表一 威妥瑪所寫的錯字

英語字條	威字錯字	馬禮遜
Boat	般尾	船尾
同上	炕般	炕船
同上	般	船
同上	拖般	拖船
bohea tea	彝茶	武彝茶
bowels	肚腸不好	肚腹不好
captain	般主	船主
coffin	棺材	棺材
emperor	大皇帝	太皇帝
exercise	散步	散步
college	英話書院	英華書院
heong tsuy sik	香嘴色	香隨息
koon kap	官幼	官級

大小及種類，英商在出入口登記及處理各種關稅申報時，「船」字的錯處就不斷重複，如拖般、般尾、般主等等。另外，散步與散步、官級及官幼、大皇帝與太皇帝等，可以說是受漢字字形相近所誤。至於英話書院及英華書院，「話」本來讀 waa6，「英華」連讀變調讀成 waa2，顯然受變調影響而出現同音字 (tone sandhi) 的情形。<sup>36</sup> 即使如此，以三百多頁共六千多條的資料而言，從百分比去看，這些錯誤仍屬九牛一毛。

仔細查看重抄本，我們會發現當時外國人學習漢字的結構、筆順和字形的一些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這些都是有力的證據，證明這手稿的確是威妥瑪本人抄寫的，絕對沒有聘用中國人代筆。研究手稿的專家都指出，手稿的重要性在於它呈現的物質文化意義，與印刷製成品的文化價值不盡相同。有時候，印刷製成品甚至會刪掉或掩蓋了手稿的多重文書 (scribes and scripts) 與物質價值 (materiality)。<sup>37</sup> 我們明白，熟習漢語的中國人，不會混淆「船」、「般」兩字的字形，更不會錯認日月、不辨才木。過去，我們對十九世紀外國人學習中文的情形，一直只能作多方面的猜想，有時甚至因為外國人與華人合作或合譯的情形甚多，而無法分辨雙方在合譯中各自的貢獻。現在可見，即使當時學習條件如何乏善可陳，外國人只要專注學習，即使來華僅五年，語言程度也能達到一定水準。

比較過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與威妥瑪手稿之後，我們還發現另一種語言現象：威妥瑪把《廣東省土話字彙》出版以來某些用語的異體字，加入手稿當中，變成了對馬禮遜原書的修訂。其中一些字詞的例子，見於表二。

從黑櫻色及黑棕色、箇及個兩例可見，威妥瑪在謄抄字典的過程中，絕不是機械地抄寫，而是按自己的知

表二 別字 / 異體字表

	威字增補	馬禮遜原載
cage	一箇雀籠	個
double	關	關
Go Kay	我的	我既
hak tsung shik	黑櫻色	黑棕色

36 感謝南洋理工大學跨語言學系黃俊傑 (Francis Wong Chun Kit) 教授賜教。

37 Daniel Hobbins, *Authorship and Publicity Before Print: Jean Gers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Medieval Learning*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9).



識，融會貫通。這除了反映他的詞彙量已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外，還顯示他應用語言（pragmatics）的能力已大大提高，能分別出語體及白話的分別，他把馬禮遜的「我既」寫成「我的」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來華的前十年間，從無中斷或停止學習，並因應時代變遷而作出更多的嘗試及努力。威妥瑪必須溫故知新，除了因為語言不斷變遷、新詞新字相繼湧現之外，還要顧及自己和國家的需要，緊貼時代步伐，學習新知識。

### 三、裨治文《廣東方言彙編》

1846 年，威妥瑪於手稿上作了另一次大型的增補。這跟之前在個別詞彙及條目下所作的小補充是不一樣的，而且是用一種超越馬禮遜文本的方式，並因應他於 1846 年事業上取得的新突破而來。

1846 年 2 月，威妥瑪終於能棄戎從文，正式受僱為香港政府譯員。他出任的職位是相對顯赫的香港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譯員，年薪 405 英鎊。<sup>38</sup> 雖然威妥瑪於 1843 年沒有獲得外交部任何正式批准以軍人身分擔當軍中譯員，但這卻堅定了他的志向。1844 年間他稍事回國休養後，決定於 1845 年回港進一步探索前路。由於之前他跟隨璞鼎查時的工作表現出色，璞鼎查卸任後回英，特別與英國漢學推手史當東會面時提起這年輕人。<sup>39</sup> 至於璞鼎查的繼任人暨第二任港督德庇時，同樣對他另眼相看。1846 年 1 月 26 日，德庇時向外交部極力推薦威妥瑪，並願意用香港已有的教育資金資助他繼續自學，<sup>40</sup> 同時要求外交部批准他留港成為譯員。德庇時在推薦中指出，威妥瑪做事非常有效率，超乎尋常的勤奮，令他的中文程度達到相當的水準（“very efficient, and that his extraordinary diligence has enabled him to acquire very respectable attainment in the language of China”）。時間證明德庇時的評價

38 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Records (以下簡稱 C.O.), 133/3/98 (24 February 1846).

39 F.O. 17/119/179, Staunton to Palmerson (10 December 1846); 或見關詩珮，〈英法《南京條約》譯戰與英國漢學的成立——「英國漢學之父」斯當東的貢獻〉，《翻譯史研究》3(2013): 128-164。

40 F.O. 17/19/100 (26 January 1846).

甚公允，絕無偏私。<sup>41</sup>

爲了應付新工作的挑戰，威妥瑪需要增加新的語言知識，特別是 1828 到 1846 年間，香港因爲鴉片戰爭而開埠成爲重要商貿港口後，廣東省人口流動迅速，移民社群發展蓬勃。<sup>42</sup> 粵語的詞彙及應用範圍也隨時代增加，而於 1828 年出版的馬禮遜字典所收的詞彙及類型已不敷應用。威妥瑪自知語言是流動的，而且需要活用，因此他於 1846 年開始，重新在手抄本的內頁，加入讀本及老師們教導的內容。他在扉頁上寫到：

February 1846, I added to the interleaf much from the chrestomathy and much from the teachers.

他明言：「從 1846 年 2 月起，我在內頁中增加了不少從讀本及老師們教導的內容。」威妥瑪沒有說明他從哪一讀本抄出，但經過細心的對比及爬梳，我們可以確定那些內容是從裨治文《廣東方言彙編》而來。<sup>43</sup>

裨治文的生平其實不用再多作介紹，<sup>44</sup> 他是美國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爲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會（美部會）所差派。由於深受馬禮遜的影響，加上各分會看到倫敦傳道會在中國新興的傳教事業漸見雛型，於是他便決心跟隨馬禮遜的步伐來華傳教。裨治文於 1830 年 1 月 22 日抵達澳門，後來積極參與《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的編輯工作以及《聖經》翻譯。裨治文在 1841 年出版《廣東方言彙編》，是他在廣州生活了一段頗長時間後的

41 F.O. 17/121/19 (16 February 1847).

42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43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廣東方言彙編》書名為筆者中譯。

44 有關裨治文生平的資料很多，於十九世紀同代人所撰的，包括他太太 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所寫的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Anson D. F. Randolph, 1864)；以及由同為傳教士的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所寫的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p. 68-72；另外，近年出版有關裨治文的傳記有 Michael C. Lazich, *E. 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00).

精心傑作，<sup>45</sup>這是十九世紀傳教士編纂的第二部粵方言雙語詞典，並在「中國益智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鼎力支持下編成。裨治文雖為詞典的編纂者，但他卻自謙說這是各個到華傳教士及漢學家互相幫忙並共同編製的心血，可謂集各家大成。編纂過程中不單有華人助手幫忙，還有其他的參與者，陣容強大：馬儒翰閱讀了大部分的初稿內容，並作了一定的修訂；羅伯聃準備第五及第六章有關貿易的詞條；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協助撰寫「自然史」一章、其他一些次要的內容，以及整個檢索表。<sup>46</sup>

《廣東方言彙編》全書共 693 頁，附有長達 36 頁的導言(introduction)，說明廣東話的語音、詞彙、語法特點，並對中國古代典籍作出概括性的介紹，甚至建議閱讀的參考書。導言後共有 17 篇(chapter)，分為 Study of Chinese 習唐話(「習唐話」為原文中英對譯語；下同)、The Human Body 身體、The Kindred Relations 親誼、Classes of Men 人品、Domestic Affairs 日用、Commercial Affairs 貿易、Mechanical Affairs 工藝、Architecture 工匠、Agriculture 耕農、The Liberal Arts 六藝、Mathematics 數學、Geography 地理志、Mineralogy 石論、Botany 草木、Zoology 生物、Medicine 醫學、Governmental Affairs 王制，每篇又內分若干節，共 604 頁。以第一篇習唐話為例，其中包含教學用語、《三字經》、毛筆寫字的方法、漢字的結構和書寫等內容。每頁正文分三欄，依次為英文、漢語、羅馬注音，每頁下半部分是詳細的英語注釋。書後附 89 頁英漢檢索。課文以口語為主，偶有摻雜文言用語。唯第 16、17 兩篇，多半以文言書寫。從內容可見，《廣東方言彙編》是以中國類書的形式來編排，換言之，是依據事物的性質分出若干門類和細目，再依據類目編排文獻資料。對於不熟悉中國古書分類名目的讀者而言，便不易查檢。

不過，就分類方法及處理知識編排系統而言，裨治文一書比起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不單更有系統，而且更詳盡精確，尤其是解釋每一詞條時，

45 裨治文對廣州認識之深，甚至可以從他的日記內容中編輯出一本廣州百科全書，見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Glimpses of Canton: The Diary of Elijah C. Bridgman, 1834-1838* (New Haven, CT: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1998).

46 *Canton Register*, Macao, 10 June 1841.

會先列出英語，再寫出漢字意思，最後才列出粵語拼音，而且章節條目分明。裨治文甚至極細心地選用不同字體大小（font size）及書法（calligraphy），標明各個章節的關係，譬如 Section 選用 Gold Ultra Black 字體，而章節則用 Sybarite Medium。<sup>47</sup> 而且各層次不單以字形字體標示，更會用字形大小標示。而在說明廣東語音時，就在第一章第 III 節拼音方法（Orthography adopted）內，清楚寫出是來自當時非常流行和無人不識的語言學家 William Jones（1746-1794）及 Mr Pickering（即 John Pickering, 1777-1846）的意見。我們看到，其中一點最能補充或突破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標音問題的是，用英語標點符號中的 apostrophe（或裨治文所指的 diacritical mark）來標示廣東拼音中的送氣與不送氣。亦即是說，只要我們深入瞭解威妥瑪抄寫的《廣東方言彙編》，就能明白到他是否已體察這語音的重要性，甚至有否影響他日後拼音系統的創設。<sup>48</sup>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威妥瑪沒有很深入研究《廣東方言彙編》，也沒有重抄它的所有詞條。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他並無這個需要。《廣東方言彙編》於 1841 年出版之際，他已來華，而且大有可能通過作者裨治文或其他漢學家的介紹立即購入此書。威妥瑪的經濟條件不俗，為學習漢語不惜工本，很願意花錢購買書籍，<sup>49</sup> 甚至有需要時還會自資出版。<sup>50</sup> 因此他在這時並不以抄寫為複印手稿的手段，也無需以抄寫來鍛鍊中文造詣，1846 年時他的漢語程度已達上級水準。那麼，這樣的抄寫工序能達到什麼目的，又反映了他在

---

47 感謝南洋理工大學藝術、設計與媒體學院楊佩華教授（Jesvin Yeo Puay Hwa）賜教。

48 Emily Runde, “Reexamining Orthographic Practice in the Auchinleck Manuscript through Study of Complete Scribal Corpora,” in Robert Allen Cloutier, Anne Marie Hamilton-Brehm, and William A. Kretzschmar, Jr., ed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English Grammar and Lexicon: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0), pp. 265-287.

49 他捐贈給劍橋大學的藏書，目錄可見 Herbert A. Giles, *A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8); Herbert A. Giles,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5).

50 F.O. 17/704/331-335 (17 November 1878).

學習漢語過程中哪方面的能力？

威妥瑪抄寫的部分是書後索引清單 (back-of-the-book index)。<sup>51</sup> 他要做的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行為，把《廣東方言彙編》書後的檢索表 (圖三) 所列的每一個概念，置入手稿的正文內容。

A,	yat,	8	4	Abundant,	fán,	35	59
A little, n	yau ti kóm tó,	58	42	Abundant most,	tsui tó,	434	16
Abacus,	sün pún,	171	15	Abuse one, to,	má yan,	549	324
Abandon, to,	wóng mú,	538	97	Acacia,	siú sak fá,	451	1
Abandon and destroy,	wai hí,	544	218	Academy,	shé hòk,	308	3
Abandoned fellow,	t'ò, lán tsai,	125	8	Academy, imperial,	hòn lam ün,	308	4
Abandon family, to,	ch'ut ká,	124	16	Acanthurus,	hak tséung kwan ts'óng,	488	227
Abate a little, to,	kám tik,	239	29	Acanthus ilicifolius,	lóng fá lik,	453	44
Abatement,	kám shíú,	198	1	Accipenser,	tsam lung ü,	488	225
Abdomen, n	fuk,	515	1	Accipitrine birds,	ying lui,	471	1
Abdomen small,	siú fuk,	515	1	Accommodate, not,	m tsó tak,	131	14
Abet, to,	kung mau,	547	279	Accomplices,	tsung,	535	30
Abide,	on, 417 4; ts'ün,	112	14	Accomplished,	man,	565	28
Abide, to,	hang ts'ün,	118	15	Accomplishments, n	lai,	368	1
Ability to eat, n	léung,	177	24	Accompany, to,	fú,	569	12
Able, Ability,	nang,	119	25	Accompany, out to,	sung ch'ut,	189	63
Able, n	tak,	2	5	Accordance to,	ts'ün chíú,	221	4
Aboard ship,	hang shün,	160	9	According to,	tsung, 75 87; kü, 90	72	
Abode, permanent,	yat ting chí ü,	417	4	According to,	léung, 128 6; i, 243	44	
Abortion, Abortio,	siú ch'án,	502	3	According to,	ts'ui,	189	64
About,	shéung há,	84	14	Accordingly,	tsik,	183	6
About how much,	yéuk tò shíú,	257	2	Account, an, n	chéung muk,	198	2
About to break,	tséung kít,	280	29	Account-book, n	chéung muk shò pò,	198	2
About 8 minutes.	kankai náit fan. 404	10	10	Account, keep on	shéung shà,	170	11

圖三 裨治文《廣東方言彙編》總索引 (General Index)

我們都知道，檢索頁按西洋字母 A 至 Z 順序排列，作者在完稿後，他或索引製作者 (indexers) 掌握全書內容後，會抽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單詞概括全書，目的是讓預設讀者能迅速回檢書中對應的頁數，以個別概念衡量書籍內容是否與自己閱讀期待成正比，再作全面閱覽。因此，製作索引時，往往需要以讀者或用者的角度去整理書內的關鍵概念。從功利角度而言，索引方便了讀者在購書或貸書前檢查書籍內容的涵蓋性及實用性，能增加銷售量及流通性。當然，這同時也有助傳播知識，圖書館資訊管理部門或目錄學者 (bibliographers, cataloguers) 會據索引再進一步整合資料，作分類書籍及統計之用。<sup>52</sup>

51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General Index," pp. 152 or 605.

52 Henry B. Wheatley, *What Is an Index? A Few Notes on Indexes and Indexers* (Cambrid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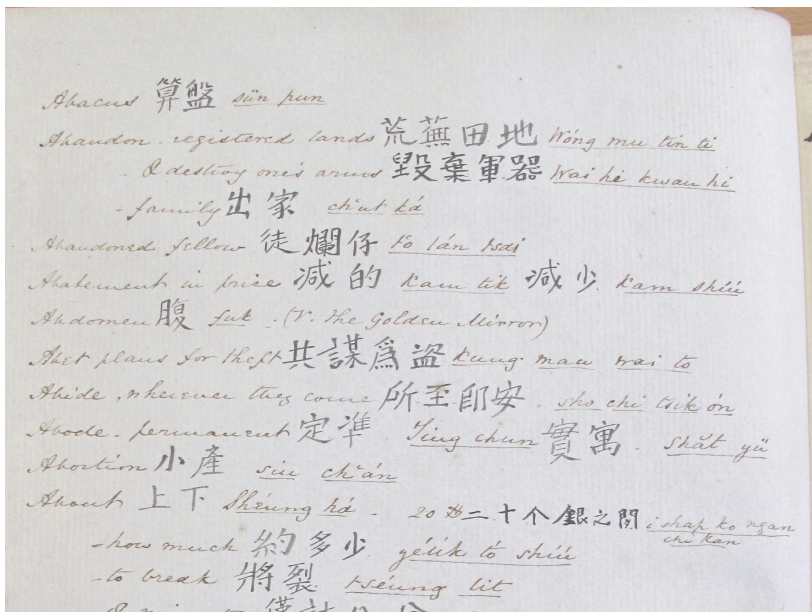
威妥瑪結集兩書的內容，從字典整理角度而言，他全面更新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的語彙，利用圖書合成方法，為它造了一個擴充版（*augmented version*）。不過，像其他書籍一樣，《廣東方言彙編》檢索列表內的單詞與頁碼是對應書內的概念及內容，這個互文（檢索正文）系統的意義，只存在於一種文本內（*intra-text*）的交互引用關係。因此把一書的索引頁抄到另一本書內的做法，有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要理解威妥瑪這舉動，我們首先要釐清《廣東方言彙編》的結構及檢索功能。《廣東方言彙編》的索引與一般著作的索引不同之處，是它在每個英語字詞後面，會排出該詞組的廣東話語音，然後再於旁邊分別列出英語及該廣東話內容正文的相應頁碼及欄目，讓檢索者翻到正文內頁，回查分散在各章內有關該詞條的內容。現舉檢索表第三個詞 *Abacus* 作例子說明（起首第一及第二個字為冠詞 *A* 及 *An*，故可以不論）。於 *Abacus* 一詞旁的第二欄，是粵語拼音 *sūn pūn*，兩旁再列有正文相應頁數 171 頁及 15 項。使用者只需按圖索驥，在正文內第 171 頁即第五章「日用（*Domestic Affairs*）」類下的第 15 項找到 *Abacus* 一條，釋詞為「我睇你計唔準擰算盤再覆過」（*I think you have made a mistake in the reckoning, bring the abacus and let me see you reckon it again*）。那麼，算盤的拼音、釋詞、用例等都一目了然。威妥瑪所做的，是以索引為綱，從英文字母 *A* 起，來回覆照索引與正文內有關該字的所有意義，然後再連拼音、釋詞、用例抄入自己的手稿內（見圖四）。平放手稿後，讓左右兩邊對照，就會看到兩邊整齊有序地由字母 *A* 排起的詞彙，新舊對照一目了然。而這亦補充了馬禮遜字典 *A* 字條目下沒收錄的內容。一般讀者其實並不會特別看重總索引的價值，但威妥瑪顯然是精心思考過要如何組織兩本有不同排序系統書籍所呈現出來的知識，以方便自己檢索及學習。

這手稿對威妥瑪而言，正如上面的推論，是他在工作或學習上遇有難題時即場翻閱的工具書，因此，他以英文字母作統一檢索的排列系統，有組織地同時呈現本來散落在兩本書中以不同結構編輯而成的資訊，大大提高了他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79/2010); John Feather and Rodney Paul Sturge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480.



圖四 威妥瑪手稿正文左邊第一頁，抄寫裨治文《廣東方言彙編》A詞條

檢索的效率。威妥瑪做事不單整齊有序，而且具靈活性及創意。過去研究抄寫、複寫、臨摹特別是翻譯（一種廣義的從外語複寫到本語的文字活動），往往認為是被動、沒有創意、沒有涉及主體性的工作，然而在威妥瑪的抄寫過程中，我們至少看到謄抄、臨摹同樣需要創新思維，在有限度的改寫上創新。<sup>53</sup> 在整理多種排列系統（包括漢字方塊字系統、英語字母系統、方言拼音系統等等）方面，他有清晰整合的視野及知識技能。他這樣做，是一項集大成的工作，亦同時消除了各漢學家因應不同排序系統編排出來的漢學知識。可以說，在十九世紀中英交往初建立的一段時期，英國漢學系統出現的

53 Ann Beylard-Ozeroff, Jana Králová, and Barbara Moser-Mercer, eds., *Translators' Strategies and Creativit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Prague, September, 1995: in Honor of Jiří Levý and Anton Popovič* (Amsterdam: J. Benjamins Pub., 1998); Eugenia Loffredo and Manuela Perteghella, eds., *Translation and Creativity: Perspectives on Creative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06).

是一種混亂無序或各自為政的局面。這種無序的情形，在當時是極嚴峻的。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雖然資料豐富，但可惜連最基本的頁碼都欠奉，這不是印刷技術的問題，而是他沒有以西方排版編目的方式去處理。就好像馬禮遜在同期（1819 年起）編訂《英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 Volume 1, Part 2 of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時，他完全以《康熙字典》作藍本。《康熙字典》是以中國人熟習的 214 部首出發，外國人倘未習得中國漢字的字形結構時，特別是背後由《說文解字》而來的文字學原則的部首及歸字，其實無法有效查到所需。<sup>54</sup> 這本來就是一個弔詭的情形：檢索者查字典的動機是為了認識這個字，然而查字典的基礎方法卻要求學習者已對這個字有一定的認識，或已知道部首分類。這跟西方字典的排序及檢索並不一樣。西方字典以字母排序，並不要求讀者對字義有一定的認識。

雖然馬禮遜編訂《廣東省土話字彙》時，是以字母系統編排第一及第二部分，但第三部分卻是以合併的方式處理。他先把各種中國相關的人、事、物以名物歸類，並得出 24 類。這 24 類包括世務類、天文氣候類全、禽獸類全、顏色類全、艱苦類全、疾病類全、飲食類全、情分類、魚蟲類全、朋友類全、親誼類全、笑談類全、文字類全、軍戎類全、名分類一、地方類全、貧賤類全、品格類一、爭鬧類全、富貴類全、盜賊類全、貿易類全、器皿類、惡黨類全。全書欠頁數，卻以廣東方言把這些類目的拼音列為章節頁頭（header），如世務類的 77 頁資料，就分別放在 Shei-Mow-Luy（世務類）頁下。接著的第二類，就是 Teen-Mǎn-He-Hǎw-Luy-Tsune（天文氣候類全）。對初學者而言，檢索條目紊亂，系統性不強，令人有種無所適從的感覺。固然，我們明白詞類編輯者（lexicographer）會因應詞彙的範圍、時代需要、社會及讀者的需要、出版限制（如字典大小、印刷技術、經費）等作出一定的編輯選擇。不過，馬禮遜這裡呈現的混亂，卻似是另一種問題。他作為新教來華第一人，以及作為編輯英華字典的創始人，他既希望方便西方讀者，卻又想

54 杜希德曾批評馬禮遜的做法，他認為不應仿照中國的排列方式。見 Denis Twitchett, *Land Ten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ang and Sung China*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2), pp. 6-7.



向西方讀者介紹有別於西方文化的中國知識，於是他混合了三種排序：類目、廣東拼音以及英語字母。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地重看這 24 類類目，其實是根據英語字母排序而來：Affairs of the World、Astronomy、Times and Seasons、Birds and Beast、Colors...。不過，全書並無任何說明，最當眼之處，只是第三部（Part 3）的一個寫有“an Appendix of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classes, by Natives”的附錄表而已。

另一方面，裨治文一書的編排方法，正如上文所介紹，與馬禮遜一書又不盡相同。兩書都是有關廣東方言詞彙編最實用亦最受好評的參考書，今天回看粵方言的雙語字典，兩書都是最重要的開山之作。<sup>55</sup>但作為讀者，特別是當時急迫需要學習漢語的情形下，面對紛紜知識系統，何去何從呢？這些問題，並不純粹出自當時對外漢語教學概念還沒有成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漢學家各自代表不同機構、不同時代，根據各自的視野及實力，制訂出不同形式的讀本或教材。平心而論，學者以各行其是、百家爭鳴的態度處理學術問題，本來就是自然的學術景象。

對於威妥瑪而言，英語（羅馬）字母（alphabet）及英語字母排序（alphabetical order），變成了他網羅、編輯、處理中國漢字（Chinese character）及漢字知識系統（Chinese writing system）的一個權宜方法。他在整理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及裨治文《廣東方言彙編》時，就靈活地用上字母在西方知識體系上的排序（chronological order, time sequence）及語音（phonologic, sound）功能。<sup>56</sup>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討論到書寫系統的技術意義時就指出，這並不單是狹窄地限於製造紙張技術、書寫文房器材的發明、發明字母或把手稿送到印刷廠列印等，一個更重

---

55 參鄒嘉彥著，游汝杰譯，〈從合遜《廣東對話》看十九世紀中葉廣東的語言、文化和社會〉，《語言研究集刊》第3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頁371-389；另可參考李兆麟，〈對外粵語教與學：從教學法看對外粵語教學發展〉，特別是附錄15.1，載於吳偉平、李兆麟編，《語言學與華語二語教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9），頁184-185。

56 Isaac Taylor, *The Alphabet: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etters*, vol. 1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Paternoster Square, 1883), pp. 185-190; A. C. Moorhouse, *The Triumph of the Alphabet: A History of Writing* (New York: Schuman, 1953).

大的技術層面，是人口及其社會關係，當中的識字率及文明素養，亦即是上述物質技術真正生產的文化環境。<sup>57</sup> 威妥瑪沒有發明字母，而漢字字母化以及以字母作排序系統的方式也並非他首創。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Michel Ruggieri, 1543-1607）及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等，在學習漢語及編製首本由歐洲人編纂的「歐洲語－漢語」辭典時，<sup>58</sup> 就已經對漢字作了系統性的拼音化工作。威妥瑪的貢獻，是在中英交往最關鍵的時刻，統一並整合了五花八門的漢學知識，把知識轉化為實用技能。他早年的事業，已展現這種以英語為本來整理漢語知識的能力。後來，當他明白到廣東話在中英外交地位並不及官話實用時，他就在廣東話的基礎上，擴大了學習範圍。

另一方面，威妥瑪也認為，在英國譯者嚴重缺乏中國知識而讓英國外交節節失利的情形下，掌握多少漢學知識似乎與英國的競爭性直接掛鉤，而學術內容及知識架構跟追求政治目的更是不能分割。威妥瑪於 1846 年時已清楚看到，自己在無師自通的環境下，憑著實力整合不同的知識體系，並獨得最快掌握廣東方言的竅門。漸漸地，當他於 1854 年進一步掌握了北方官話及打下堅實的漢學基礎，他憑著同一種能力、慧見、野心及信心，毅然寫信到外交部，徑自向上級提交意見，要求讓他統籌外交部學生譯員計畫的教學內容及方向。他不單以自己創設及帶有實驗性的學習筆記《尋津錄》，證明自己的學習方法十分有效，並以自己作為最好的樣版，展示斐然的成績。他並提交兩份詳細的計畫書：〈有關中國研究謹呈包令爵士備忘錄〉（“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Submitted to John Bowring”）、<sup>59</sup> 以及 1861 年呈遞克萊頓繼任人羅素伯爵（John Russell, 1st Earl Russell, 1792-1878）的〈威妥瑪有關語言研究課程大綱謹呈羅素伯爵備忘錄〉（“Memorandum by Wade to Russell Outlining Program for Language Study”），<sup>60</sup> 指出外交部在沒有統一規劃下，漢學教授內容及安排雜亂無章，大大影響了學習效率，減低學習意願，浪費人才，甚至危害國家在華的利益。於是，他自動請纓，希望外交部給予

---

57 Raymond Williams,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p. 108-109.

58 Federico Masini, “Notes on the First Chinese Dictionary Published in Europe (1670),” *Monumenta Serica* 51(2003): 283-308.

59 F.O. 17/216/335 (9 October 1854).

60 F.O. 17/351/120 (15 March 1861).

他時間及資助，讓他統籌中國研究的資源及教材，整合一系列適合外交部譯者訓練課程的教科書。他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學習經驗，從學習者的立場出發，撰寫實用性高並富有特定學習目標的教科書。由於筆者已另文探討這些教材的背景及價值，所以這裡從略。

威妥瑪的貢獻，不單在於洞悉外交部在教學制度及教材上的問題，他更意識到語言交際的問題。中國地大物博，方言又多，對急於訓練在華譯者的英國而言，要譯員同時學習各種方言是不切實際的，這樣做只會分散學習資源。威妥瑪看到，既然中英外交語是官話（或北方話），清廷、中國官員及士紳階層等都以官話為主，英國就應設下目標，培訓譯員在最短時間內學會北方官話，避免出現衆口難調的情形。因此，學生譯員計劃以北方官話為優先學習語言，讓英國政府能通過最直接的管道跟清廷對話。為達目的，他更在專家及中國學者協助下統一了拼音系統（orthography），而且為了盡快達到目標，他在學習及編制威妥瑪拼音系統時，參考了來華漢學家的所有著作，包括馬禮遜、麥都思、羅伯聃、衛三畏、密迪樂（Thomas Taylor Meadows, 1815-1868）、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的所有論著，並作出大量的修訂。威妥瑪在整理前人的標音系統時，重塑了語音發展，並且結合當下發音慣例，統一了拼音方案。

這樣，他之前在香港長年累月刻苦學習的粵方言，便成了附屬的技能。他所投放在整理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及裨治文《廣東方言彙編》兩部字典的心血，也即將付諸流水，前功盡廢。不過，對於要徹底轉換學習方向，同時需否定自己過去建立的點點功業，他並沒有特別掙扎，也表現得毫不留戀，原因是他有一明確的志向。這點志向，一方面是漢學上的，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

#### 四、結 論

迄今為止，學界仍未完全掌握威妥瑪如何創制拼音系統。各家正循語音、個人生平、傳世文獻、交際及知識網路等蛛絲馬跡中努力鑽研。威妥瑪從未在任何私人文獻或公文中提及他的《語言自邇集》體制是仿自滿語教材《清文指要》，但在學界作了仔細的版本對讀研究後，才發現《語言自邇集》無論

在例句、全文格式或個別用字的語言上，都受到《清文指要》的影響。<sup>61</sup>《語言自邇集》寫作期間，正是他從粵語轉到學習北京官話的重要階段，馬禮遜的拼音系統一直被學界稱為是隨南方官話而來，到底這如何有助我們重構這個知識圖譜的空白，手稿可能會給語音學家更多的線索。其實，單是手稿的內容，已為我們揭示了多種研究十九世紀漢學、威妥瑪研究、對外漢語教學過程、語言文獻學、跨語翻譯（interlingual，即滿漢）、語內翻譯（北京語及粵語）知識流通的重要線索。對威妥瑪本人而言，他克服種種環境的困難，在十九世紀中葉披荊斬棘地學習粵語、漢語，他的貢獻絕不只在語音上，還在於幫助來華莘莘學子掌握了一套重要而系統的學習方法。再者，當時的漢語知識五花八門，威妥瑪能運用他的漢語知識，應用在手稿的編排上，足以展示他處理漢學知識的技能及學習方法，不遜於知識內容本身的重要性。事實證明，他編訂的教科書非常實用，獲得學生的一致好評，而且大幅度改善外交部譯員的素質。他的入門弟子翟理斯（雖然後來與威妥瑪反目），回顧自己參與譯員課程時如何學習漢語，就不諱言說：

我初入門時跟從一名不懂英語的中國人學習，當時還手持第二版馬禮遜字典。威妥瑪的書當時還沒有出版，但他的書出版後，從此令學習變得極容易。<sup>62</sup>

本文介紹了筆者所發現的威妥瑪手稿，並嘗試以這手稿作為研究中心，從歷史語言學角度簡述 1828 年起廣東話的語言發展，以此展示威妥瑪追求漢學的境界，並非只是政治野心所能概括。他的知識準備、視野、能力以及刻苦等因素，都是他達到自己最初定下要成為漢文正使的目標。而中國正式讓外國於北京設立領事制度，他獲委為英國公使（British Minister），超越了自己當初定下的目標。他的學習道路和成就，更成為了下一代外交使節及漢學家的學習典範。

---

61 （日）藤田益子，〈威妥瑪和漢語會話課本——從《語言自邇集》考察威妥瑪所追求語的語言境界〉，《新潟大学国際センター紀要》3(2007): 49-80。

62 Treasury Committee on the Organizational of Oriental Studies in Lond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Lords Commissioner of His Majesty's Treasury to Consider Organiza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in London*. Minutes of evidence to the above Committee 1909, evidence given in 1908, c.d. 4561 (London: HMSO, 1909), p. 142.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中國史學會主編，王重民等編，《太平天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
- Canton Register*. Canton: James Matheson, 1827-1843.
-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Records 17, China Correspondence.
- 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Records 133, Hong Kong Bluebook.
- India Office Records. G/12 China Factory Records 1695-1858.
- Cambridge University Thomas Wade Papers.
-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Glimpses of Canton: The Diary of Elijah C. Bridgman, 1834-1838*. New Haven, CT: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1998.
- Bridgman, Eliza J. Gillett,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Anson D. F. Randolph, 1864.
- Clark, J. W. *Endowm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4.
- Giles, Herbert A. *A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8.
- Giles, Herbert A.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5.
- Morrison, Eliza A.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and Longmans, 1839.
- Morrison, Robert.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3 Parts. Macao, China: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8.
- Taylor, Isaac. *The Alphabet: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etter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Paternoster Square, 1883.
- Treasury Committee on the Organiza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in London, *Report of the*

-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Lords Commissioner of His Majesty's Treasury to Consider Organiza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in London*. London: HMSO, 1909.
- Wade, Thomas Francis. *The Hsin Ching Lu, or Book of Experiments; Being 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Hong Kong: China Mail, 1859.
- Wade, Thomas Francis. *Wen-chien Tzŭ-ê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 Designed to Assist Students of the Language as Written by the Officials of China in Sixteen Parts*. London: Trübner, 1867.
- Wade, Thomas Francis. *Yü-yen Tzŭ-ê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in Eight Parts, with Key, Syllabary, and Writing Exercises*. London: Allen, 1886.
- Wheatley, Henry B. *What Is an Index? A Few Notes on Indexes and Index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79/2010.
- Wylie, Alexander.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 二、近人論著

- (日) 內田慶市、氷野歩、宋桔編著 2015 《語言自邇集の研究》，吹田：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 (日) 片岡新、李燕萍 2006 〈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中國語文研究》22: 21-36。
- 余靄芹 2000 〈粵語方言的歷史研究——讀《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中國語文》2000.6: 497-507。
- 李兆麟 2009 〈對外粵語教與學：從教學法看對外粵語教學發展〉，載於吳偉平、李兆麟編，《語言學與華語二語教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頁 184-185。
- 李燕萍 2009 〈對外粵語教學拼音方案的比較與討論〉，載於吳偉平、李兆麟編，《語言學與華語二語教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頁 195-209。
- 張 丹 2008 〈從馬禮遜到馬修斯——近代史上的西方漢英詞典編纂者及其作品〉，載於姚小平主編，《海外漢語探索四百年管窺》，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頁 130-135。
- 陳湛綺編 2009 《近代郵電交涉檔案彙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 詹伯慧 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鄒嘉彥著，游汝杰譯 2006 〈從合遜《廣東對話》看十九世紀中葉廣東的語言、文化 and 社會〉，《語言研究集刊》第 3 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頁 371-389。

- 鄭志民、彭桃英、楊曉寧 1992 〈英國劍橋大學威妥瑪中文特藏〉，《江蘇圖書館學報》1992.2: 42-44。
- (日) 藤田益子 2007 〈威妥瑪和漢語會話課本——從《語言自邇集》考察威妥瑪所追求語的語言境界〉，《新潟大学国際センター紀要》3: 49-80。
- 關詩珮 2014 〈翻譯課程及全人教育之爭？香港聖保羅書院與香港政府的恩怨（1849-55）〉，《翻譯史研究》4: 77-106。
- 關詩珮 2013 〈英法《南京條約》譯戰與英國漢學的成立——「英國漢學之父」斯當東的貢獻〉，《翻譯史研究》3: 128-164。
- 關詩珮 2013 〈翻譯政治及漢學知識的生產：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畫（1843-187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1(2013.9): 1-52。
- 關詩珮 2014 〈翻譯與帝國官僚：英國漢學教授佐麻須（James Summers, 1828-91）與十九世紀東亞（中日）知識的生產〉，《翻譯學研究集刊》17: 23-58。
- 蘇 精 2014 《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Aylmer, Charles. 1989. "Sir Thomas Wade and the Centenary of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 (1888-1988)." 《漢學研究》7.2(1989.12): 405-422.
- Beylard-Ozeroff, Ann, Jana Králová, and Barbara Moser-Mercer, eds. 1998. *Translators' Strategies and Creativit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Prague, September, 1995: in Honor of Jiří Levý and Anton Popovič*. Amsterdam: J. Benjamins Pub.
- Bolton, Kingsley. 2001. "The Life and Lexicography of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In Robert Morrison,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Reprint of 1828 edition, Ganesha Publishing;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v-xliv.
- Brokaw, Cynthia J. and Kai-wing Chow, eds. 2005.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ssel, Pär. 2015. "'Spelling Like a State': Some Thoughts on the Manchu Origins of the Wade-Giles System." "The Manchus and Tartar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Empire." Special Issu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58.1-2: 37-47.
- Chia, Lucille and Hilde de Weerdt, eds. 2011.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Leiden; Boston: Brill.
- Cooley, James. 1981. *T. F. Wade in China: Pioneer in Global Diplomacy 1842-1882*. Leiden: E. J. Brill.
- Feather, John and Rodney Paul Sturges, eds., 2003.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Greenberg, Michael. 1969.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via, James. 1995. "An Imperial Nomad and the Great Game: Thomas Francis Wade i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6.2(1995.12): 1-22.
- Hobbins, Daniel. 2009. *Authorship and Publicity Before Print: Jean Gers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Medieval Learning*.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Kwan, Sze Pui Uganda(關詩珮). 2013. "'A Requisite of Such Vital Importance': The Want of Interpreters in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 1839-1842." In Lawrence Wang-chi Wong, ed., *Towards a History of Translating: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4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Hong Kong: Research Center for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 3, pp. 389-417.
- Kwan, Sze Pui Uganda. 2014. "Translation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Mission: The Career of Samuel Turner Fear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 King's College, Lond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RAS)* 24.4(2014.10): 623-642.
- Kwan, Sze Pui Uganda. 2014. "Technologies of Chinese Language: Thomas Wade, Interpreter Train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omanization," talk given a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23 November, 2014.
- Kwan, Sze Pui Uganda. 2016. "The Imitation Gain: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ies of Chinese Langua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ranslation History, organised by The Graduate Program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GPT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26-27 March 2016.
- Kwan, Sze Pui Uganda. 2017.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 into World Language." In David Der-wei Wang, ed.,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zich, Michael C. 2000. *E. 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 Loffredo, Eugenia, and Manuela Perteghella, eds. 2006. *Translation and Creativity: Perspectives on Creative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Lutz, Jessie Gregory. 2008.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 Masini, Federico. 2003. "Notes on the First Chinese Dictionary Published in Europe (1670)." *Monumenta Serica* 51: 283-308.
- McMullen, D. L. 1995.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 Wide-Ranging Scholarship from a Doubtful Start." *The Magazine of the Cambridge Society* 37: 62-66.
- Moorhouse, A. C. 1953. *The Triumph of the Alphabet: A History of Writing*. New York: Schuman.
- Parkes, M. B. 1991. *Scribes, Scripts, and Readers: Studies in the Communication, Presen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edieval Texts*. London: Hambledon Press.
- Powell, Barry B. 2009. *Writing: Theory and History of the Technology of Civilization*. Chichester, UK;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 Runde, Emily. 2010. "Reexamining Orthographic Practice in the Auchinleck Manuscript through Study of Complete Scribal Corpora." In Robert Allen Cloutier, Anne Marie Hamilton-Brehm, and William A. Kretschmar, Jr., ed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English Grammar and Lexicon: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Snow, Don. 2004. *Cantonese as Written Language: The Growth of a Written Chinese Vernacul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Twitchett, Denis. 1962. *Land Ten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ang and Sung China*.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 Williams, Raymond. 1995.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manizing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Sir Thomas Wade's Manuscript of Transcriptions of Robert Morrison's and Elijah Coleman Bridgman's Dictionaries**

Uganda Sze Pui Kwan\*

### **Abstract**

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was known to the world as a sinologist and successful diplomat. One of his most significant legacies is his engineering of the Wade-Giles romanization system, which greatly facilitated the learning and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 by Westerners. Wade was an innovator and a reformer. He refined the previous romanization methods used by early European missionaries to China, basing his system upon Mandarin, the dialect used i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among the scholar-gentry. Hitherto, he did not leave much trace of how he produced his romanization system.

The recent discovery of a manuscript by Wade can now provide us with some insights to such questions. This manuscript indicates clearly that Wade studiously and meticulously transcribed every single entry from several Chinese dictionaries written b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Canton at the time, adding remarks and correcting misspellings. By closely comparing Wade's manuscript and the dictionaries he transcribed, this paper tries to show that

---

\* Uganda Sze Pui Kw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regenerating a dictionary is an important way of producing knowledge about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s manuscript is particularly valuable because it was created before a universal system for romanizing Chinese had been developed, and the translations relied on the compiler's personal horizon and knowledge of local dialects and his preferred system of transliteration. The manuscript is fascinating textual proof of early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Europeans and Chinese, the local people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China.

**Keywords:** Thomas Francis Wade, Robert Morrison,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Chinese language, Canton dialect